

现代管理科学

经济数学模型

经济结构理论

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法

系统工程学译文辑

计算机应用概况

名词解释与人物介绍

技术经济分析与设计

经济结构理论

3

现代经济管理科学资料汇编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研究室 编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管理工程教研室

目 录

72
3

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	于光远	1
贯穿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许涤新	6
当前应当研究的若干经济问题	孙尚清	10
实现四化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革	马 洪	14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一些看法	孙尚清 周叔连 吴家骏 张卓元	19
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需要研究的二十个问题	柳随年	40
对我国工业部门结构的初步探讨	高 梓 苗天杰	51
平衡、平衡法、平衡表	乌家培	60
必须自觉地保持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	柳随年	66
我省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陕西省革委会统计局	73
关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涵义	〔保〕C·沙拉乌诺夫	75
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平衡、经济效率	〔匈〕爱尔杜什·蒂波尔	79
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	〔波〕布·明兹	81
产业循环和产业联系分析	〔日〕关恒义	85
农业和部门间联系	〔苏〕弗·吉洪诺夫	94
美国社会经济部门结构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美日西欧组	98
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结构	〔苏〕索·海因曼	104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础结构	〔苏〕维·然明	113
英经济学家埃曼谈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计划存在的问题	刘泽曾摘译	119
苏联战后初期(1945—1953年)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	〔苏〕P·A·别洛乌索夫 П·H·克雷洛夫	123
苏联的扩大再生产速度和国民经济结构	〔苏〕T·索罗金等	128
关于南朝鲜经济结构的若干情况	秦洪祥编译	143
西欧五国经济观感	里 岗	150
《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产量和生产结构》一书简介	选自《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期	156
美国80年代26种工业前景预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79.10.15	157

世界经济的结构·····	〔美〕瓦西里·列昂节夫	160
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一些统计·····	钟禾译	172
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	胡德伟	179
港粤之间的经济合作·····	刘佩琼	182
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和年龄·····	大卉译	185

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

于 光 远

为了在我国实现四化，就要研究许多经济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的问题是其中之一。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应该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看法：这就是根据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我们说的最终产品？它第一包括个人消费品，这是最终产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包括发展社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保健等事业所需要的物品。第三包括进行社会管理和阶级斗争所需要的物品（主要是用来加强国防的物品）。第四包括出口用的产品。我们说的最终产品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理论依据的。它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的最终产品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讲最终产品（他们常常用最终需求这个名词）。举列昂节夫为例（这个列昂节夫不是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苏联经济学家的列昂节夫，而是搞投入产出法的从俄国跑到美国去的那个列昂节夫），他认为有四种最终需求，这四种就是：一、投资需求；二、消费需求；三、政府采购；四、出口需求。在这四个当中，有两个“消费”与“出口”是同我们说的相同，其余两个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投资需求说成是最终需求，是有道理的，它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价值生产而且是剩余价值生产，进一步说还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生产，还是扩大资本的生产。扩大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所以满足投资需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目的。用作投资的生产资料因此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最终产品。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斯大林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中，明确地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为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投资不是最终需求，用来投资的生产资料不是最终产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政府采购也说成最终需求是有道理的，它也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是私人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是建立在私人垄断资本基础上的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結合。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了政府，它的产品就应该看做是最终产品。但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它的产品本来就是属于国家的，不能把卖给政府的产品看成是最终产品。总括起来，就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来说，凡是资本家生产出来而又卖了出去的产品都可以看成是最终产品，只有在自

已的资本运动的过程中才是中间产品。除了一国的社会生产来说，用来出口的产品不论是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都应该承认是最终产品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准备进入各种消费领域的产品才是最终产品。上面列举的前三个方面，说的就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几个不同的消费领域。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该把增产最终产品作为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最后目标。这里说的整个经济活动，首先是直接生产活动，其中包括生产可以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各种劳务的生产活动，其次也包括为生产服务的、对生产发生作用的流通机构、服务机构、科技教育机构、管理机构中人们的活动，最终产品生产出来之后的分配和消费活动，则不包括在内，它不属于最终产品的生产而属于最终产品的实现。

明确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目标，可以提高每个生产部门、经济部门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不这样，就难以避免某些部门缺少整体观念，把本部门的生产看作孤立存在的东西去发展。

按照对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这个理解，必然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之一，就是在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时候应该从增产最终产品出发。去年春天起，我们强调提出这个观点，是有针对性的。第一是针对我们从解放初期从苏联学来的从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的计划方法。这种主要的产品，最重要的大约有三、四十种，扩大一点大约七、八十种，再扩大一点大约一百多种。在这许多种主要产品中，既包括重工业产品，也包括轻工业产品。也包括农产品。这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实行的方法。第二是，也针对我国很长时期内事实上实行的从重工业出发，按照重轻农的次序来计划和安排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状况，特别是针对“以钢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状况。（尽管我们经常讲要以农轻重为序，甚至主观上也真的那么想）这就是说我们强调要用从最终产品出发的“一元论”，来代替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的“多元论”，用从最终产品的“一元论”来代替从重工业出发、从“钢”出发的“一元论”。

从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并不是以前没有人提出过的思想。在外国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讨论。在有些国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方法上曾经有过三种主张的争论，一是资源法，即主张从本国资源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二是部门法，即主张从各部门产品的增产目标出发计划和安排生产，三就是最终产品法。争论的内容是何者更为优越。不过在实际生活中都没有实行资源和最终产品法，一般通行的还是部门法，或者在部门法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补。部门法是最容易做到的，并且是既成事实，但是缺点确实很多。资源是必须考虑的条件，但是生产的目的是发挥资源的作用，资源法我们认为是不应该采取的。最终产品法的缺点是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如果决定实行一定也会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实行中也一定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应该认真考虑研究。不过我们的主张同外国人说的最终产品法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我们说的最终产品不包括任何生产资料（出口除外），这是与外国人所讲的最终产品法不同的。我们认为只有坚持这一点，最终产品法在理论上才能是始终一贯的。

以增产最终产品为目标来计划和安排生产，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两者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很接近的。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在农、轻产品中最终产品

占的比重大，在重工业中最终产品占的比重小，所以农轻产品的多少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最终产品的多少。但是农业轻工业产品，和最终产品、重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概念。许多重工业产品如洗衣机，电冰箱等等都是生活资料，都是最终产品。而许多轻工业农业产品都是生产资料，都是中间产品。因此农轻产品与最终产品，重工业产品与中间产品，它们可以接近，也可以不接近。从最终产品出发也就一定以农轻重为序。例如在发达的国家中，最终产品中重工业产品占的比重很大。美国三大经济支柱，轿车和住宅建筑当然属于重工业产品，但应该说是最终产品。如果我国的经济也发达到这一步，那就不能再说从最终产品出发和以农轻重为序在我国是很接近的东西了。

同时农轻重为序的思想，还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的具体化。而“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方针又是建立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客观规律之上的。这个客观规律是对任何社会任何条件都适用的，但只有在象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远远没有过关的国家里，才需要特别强调“以农业为基础”这个方针，才需要强调“以农轻重为序”来计划和安排生产。这就是说“农轻重为序”中所包括的一个重要思想，或者“农轻重为序”的一个理论根据，同“以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生产”中所包括的思想，和它的理论根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农轻重为序和从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生产之间相同的地方，又要看到它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同时强调这样两个指导思想，取得互相补充的效用。

进一步讲，如果决定采用从最终产品出发来计划和安排生产的方法，就有好几个问题是必须研究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采用这个方法时，我们面对着的是已经存在着的各部门的生产能力，已经存在着的产供销关系，已经存在着的生产机构、流通机构、服务机构和管理机构，已经存在着的人的思想习惯，工作习惯等等。因此要从“部门法”改变为我们主张采用的那种“最终产品法”，就要经过一个相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要采取一些怎样的步骤，那是要进行仔细研究的。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只是解决了进行计划方法改革的方向问题，而步骤的问题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那是需要另作研究的。不能认为方针性的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经济工作、计划工作是很复杂的、很具体的工作，每采取一个实际步骤都要作精确的计算，反复地考虑斟酌。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采用了从最终产品出发来计划和安排生产，仍旧并没有解决最终产品的结构和数量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要吃、穿、住、用，但是吃、穿、住、用，在不同国家里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并不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时候，消费品的构成是不一样的。消费品的数量也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至于社会其他需要的产品的构成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最终产品的合理结构和数量只能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国际条件等来确定，而且在计划和安排时也不是事先已经确切知道的，而是要进行很多的测算，要经过反复的平衡工作。

第三个问题，从最终产品出发来计划和安排生产当然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中间产品的生产，恰恰相反，如果不抓好中间产品的生产，就决不可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问题是在决定采取从最终产品出发计划和安排生产之后，就有可能使整个中间产

品的生产能够做到更加合理，同时也可以做到更加合理地安排进口和出口。这就是说，采用“最终产品法”之法，就可以做到优先安排为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如果我们充分重视肉这种最终产品，我们就会充分重视为发展畜牧业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在过去这是得不到优先考虑的。采用“最终产品法”，就是在决定了各种最终产品的结构和数量之后，根据一国当时的各种具体条件确定各种中间产品的结构和数量，同时也取决于采取什么途径来取得这些最终产品。如同样的化工产品可以用煤作为原料也可以用石油作为原料，生产这些产品所要消耗的电可以由火力发出的也可以是由水力发出的，如此等等。而且在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之间，各种生产资料之间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而且这种不平衡有的又有可能通过进出口来调节，有的则不能。……这里仍有许多复杂的情况。

除了这三个问题外，还有其他别的需要提出和研究的问题。

因此从最终产品出发来计划和安排生产是一件需要通过完成大量研究工作和通过大量经济工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几个月前在思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又进一步想到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的问题。现在我们计划和安排生产既然是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产指标做出发点，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以完成这若干种重要产品指标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准。换句话说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就是这若干种主要产品的产量、产值和它们比上年度增长的速度。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这样说，这样做对不对呢？我们认为，若干种主要产品的产量、产值以及它们增长的速度，对于衡量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特别是在检查某一部门的成绩，某一种产品生产的业绩，不考核这些产品的产量、产值又考核什么呢？就是对考核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在没有用别的数字作为衡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之前，也只能用这种数字来表示我们经济建设的成绩。连外国的统计也都提供这样的数字，可供我们研究，并把它和我国这方面的数字进行比较。除了各主要部门产品增长的数字之外，还有整个工农业产品总值，它是用来近似地表示社会生产全部产品的数量的，不过其中包括大量的重复计算。因此它的绝对值是没有准确意义的。但是这些工农业生产值可以用来和其他年份来作比较，也可以用来同采用同样统计方法的外国比较。现在不用这样的数字是完全不行的。

但是我们认为也有必要指出这样的数字、指标来衡量我国经济工作的好坏，从理论上说是有缺陷的，从实践来说对于我们的经济事业也是会有某些不利影响的。

为什么说这样做从理论上说是有缺陷的呢？因为这若干种主要产品的增长，并不一定与最终产品的增长完全成比例。很有可能从这若干种主要产品增长的数字来看，经济发展的速度显得比较快，而事实上从最终产品的增长来看，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可能实际上慢得相当多。这就是说，有可能发生大量中间产品虽然生产出来了，但是积压在仓库里；或者有大量在制品停滞在生产过程中；或者制成了生产工具，但是大量设备的利用率很低，不能发挥效用；或者原材料消耗高……这就有可能大量的中间产品没有能变成最终产品。这些中间产品，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因而也不再有价值的东西，即最后成了废品，或者白白地耗费掉了。这些浪费掉的产品从统计表上来看只能看

出他们是已经生产了出来，而他们的浪费却往往不去统计，因而在统计表上反映不出来的。如果我们只看各主要部门的产量、产值就会这样。

还有一个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标准这就是计算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采用这个数字比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工农业生产总值要科学一些，因为在这个数字当中去掉了重复计算的因素和去掉了在生产中消耗掉的各种物化劳动的价值。而且这样的数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统计项目。它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四种最终产品的总和很接近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统计项目。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数字上和外国进行比较。因为在没有别的更好的数字可以用来衡量国民经济的发展之前，采用国民收入或者说采用一年中新创造出来的财富的价值衡量成绩比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好。

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标准宁愿是最终产品的增产和最能表示这种增产的各种数字。在最终产品增产的结果中，我们社会生产中“产品结构”是否合理，国民经济是否平衡发展，生产中经济效果的高低，以及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等等，都可以反映出来。更重要的是采用这样的标准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出人民生活和国家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程度。我们当然要分别统计并研究产品结构、产品积压、生产周期长短、原材料消耗率、设备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劳动就业状况等情况，但是如果要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表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话，最终产品的增产是最合适的。

当然中间产品转化为最终产品不可能是当时发生的，甚至不可能完全在当年发生。特别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建成往往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在它未建成之前，不但不能起增产最终产品的效果，甚至连中间产品也不能生产出来，然而却要求其他单位为它提供大量的中间产品。所以，以是否做到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来衡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适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例如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如果每年计算这个数字，它们表示的也是一个比较长时期内工作的结果，不只是当年工作的结果。不过部门产品的统计，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经济总产值，国民收入其实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但不如最终产品明显罢了。在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我们要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没有把增产最终产品看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因而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既对最终产品的增产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对中间产品产生不利影响。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一时期内，中间产品的生产增长得快些，而最终产品相对地说增长得慢些，但是在中间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却可以更快地实现最终产品的迅速增长。对于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增长的这些相互关系，我们应该进行历史的和逻辑的研究，看看世界上生产先进的国家都有些怎样的经验，看看在某种具体的条件下究竟应该对生产作怎样具体的安排。

总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的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研究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行事是否有利于在我国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至于如何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来制定计划，安排生产，如何进行统计以及如何对现行的各种制度和方法进行改革，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是要慎重处理。不过尽管实践中有许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明确社会主义经济目标这样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

（本文选自“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41期）

贯穿在工、农业生产中的 指导思想是什么？

许 涤 新

我现在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问题，谈谈个人的意见。

从解放到一九五七年，我国国民经济是稳步上升的，三年恢复时期是如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如此，还有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也是如此。但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又起又落，短期大起，长期大落的局面。社会生产力当然没法保持稳步上升；到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十一年的疯狂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此，我个人同不少同志一样，都认为，这是吃了“左倾”的亏，吃了冒进的亏，吃了盲目求大、盲目求快的亏。很有必要从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的得失，历史地总结经验教训。

(一)

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特别是它的基本建设，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就是不顾客观条件，指标提得高高的，基本战线拉得长长的，缺口扩得大大的。除此之外，还有财力、物力、人力的高度集中与分散的同时并存，还有片面地孤立地发展了钢铁。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时说：“为了积累，人们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奇迹，人们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所以，一部分剩余劳动必须被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垫付资本所需的数量还有一个余额”。（《资本论》第一卷第636页）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不存在转化为资本的问题。但是，要扩大再生产，要追加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须以上一年度所生产的剩余劳动产品，作为泉源。这就是说，我们的生产指标，特别是基建的指标，是受到上一年度的剩余劳动产品所制约的。我们不能超过客观存在的物资的数量提出过高的指标，更不能年年这样做。高指标是一种不承认物资数量客观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

高指标的指导思想，表现在基本建设上，就是战线越拉越长，而且层层加码，各自为政，弄得计划外的基建，谁也没法限制；计划外没法限制，计划内就没法保证。胡子工程到处有。不但不能形成生产力，而且天天要在窝工中发工资。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大浪费。

高指标的内容，就是只给任务，不给原材料或者只给一小部分原材料。这叫做“自筹”；这就是二十多年来举国闻名的“缺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指出，正常

的再生产过程要求有物资后备，他说道：“从整个社会的观点考察，就是为了要控制一批生产资料，以便补偿意外事变和自然力所能引起的异乎寻常的破坏，必须有一个不断的超额生产；也就是，生产必须超出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程度，按更大的规模进行。在这里，且不说人口增加了”（郭译本，第二卷一七九页）。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说在生产建设上，必须留有“余地”。陈云同志在管基本建设的时候，曾明确地提出要留有余地，掌握主动权。事实上，我们多少年来的做法，不但不留余地，而且人为地留有缺口。理由是“缺口”能促进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其实，“缺口”所能促进的，只是采购人员满天飞，走后门，物物交换的能动性；只是各个单位力求有备无患，备而不用、盲目大搞库存积压的积极性。结果“缺口”越来越大。人为地制造了矛盾，破坏了综合平衡，制造了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人力、物力和时间的重大损失。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一些同志的思想认识上，很有可能把集中误认为就是社会主义，而分散就是资本主义。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造高潮后的裁并改合就是一个例证，有一个城市把许多服务行业并得精光。

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权力实在过于集中。资金的统筹统支的财政大权，集中于财政部；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统一分配，大权集中在计委和物资局；劳动力的指标，控制在计委和劳动总局。这种高度集中，我看是一种“左”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高度集中不能不走到它的反面，必然带来它的对立面，这就是盲目分散。所谓“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所谓“资金、物资和劳动力三自筹”，就是高度集中的反面。从全民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也是从集中到分散的结果，有的在大型国营工厂内划出一、二个车间，变成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在许多方面，是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现在各城市的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全国各地区的社队企业，都是在国家计划之外的。盲目分散不能不算是一个体制问题。“计划外控制不了，计划内保证不了”，这就是现在全国基本建设的矛盾局面。

工业战线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还有一个“以钢为纲”的方针的问题。这个方针的特点就是孤立地突出了钢，对钢的生产，求多求快，而忽视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由于孤立地发展了钢，许多生产部门的生产，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因为电力和燃料的缺乏，不少地区为了“保钢”，不得不牺牲其它部门的生产。

(二)

多少年来，农业生产是逐步在增长的，但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表现在：

一、基本核算单位急于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认为“穷过渡”就是革命。“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仍然有人主张这样干，不顾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顾当地的具体条件，不经社员群众讨论，长官意志，急如星火。这种干法就是穷队在“共”富队的产；大队在“共”生产队的产；这种干法，引起了砍树、卖牲口，破坏了生产队的生产力。这难道不是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这难道不是在违反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吗？

二、农业方面的问题还表现在不顾当前的实际情况，取消了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认为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彻底革命”。这种干法，就是在破坏集体农业的必要补充，取消各色各样农副业的生产，弄得除了集体生产的粮食和少数几种产品之外，什

么东西也看不见。

三、与此同时，不少地区还取消了农村集市贸易，把农民赶集认为是资本主义活动。在农村集市中，投机倒把，利用两地差价进行活动，那是有的，但这不是主要的部分。在农村集市中，比重最大的是产销直接见面，是社员之间调剂余缺。实践证明，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结果，市价更加高涨。开放农村集市的地区，农民便于调剂余缺，由于各种物品供应增加，市价反而平稳。关闭农村集市的结果，除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外，没有其他渠道，只能使农副产品的生产日益减少。

四、再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否定其他生产的单打一。无区别地要求各地粮食自给，主观地强迫各地提高粮食产量的指标。高指标的作用是为了高征购。广东的老百姓说是：“以粮为网，一网打尽”。几年前，我的家乡潮汕六十万亩招柑、福柑，全部砍倒改成种田。

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大家千方百计想办法，于是一季稻改为两季；两季稻改为三季。我去年在苏州问到地委书记，他也知道这种做法问题很多，但是年产要达二千斤、二千五百斤的指标，不这么干就没有把握，还要加上复种、间种，这使农业劳动力周转不过来，社员特别是女社员的体力很感到疲乏；也使地力过度消耗，得不到休养，越种越薄。其次，多种一季稻，就要多增加一次投资，而化肥（如氨水）的供应不够，只好千方百计，高价走后门，化肥价格越来越高，一斤粮食的收购价格一角多，而其成本，一般是二角多以至三角多，多产一斤稻子，就要多亏一、二角的成本，这样下去，集体农业的积累，社员的工分收入自然都成了问题。三季稻的时间太短，谷子长得不饱满，因为时间太短，没法种粳稻，只能种籼稻，籼米的收购价是低于粳米的，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产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

为了粮食自给，有的牧区弃牧种粮，有的林区毁林开荒，有的经济作物区被迫改种粮食，有的湖区盲目填湖造田，致使草地被破坏，森林被砍光，水源被壅塞，土地沙化发展，水土流失严重。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五、再就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按劳分配明明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至今在有的地方还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因为实行按劳分配就要承认社员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承认社员在分配上的差别。有些人认为大家都拿一样的工分，才是社会主义。公然要搞平均主义，当然吃不开。但是，一年评一次或半年评一次的“大概工分”同平均主义的差别有多大呢？

（三）

无论工业和农业，这些做法，在思想上，是有其根据的。

一、要搞生产，就必须有物的因素同人的因素的结合。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生产中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有些同志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了不应有的程度。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例证。既然如此，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要求，就完全被否定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效果如何呢？只能骗自己。

二、不论在城市和农村，现在还有许多人把平均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有的甚至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共同贫困，都过清教徒的生活。所谓“富则修”，“穷则荣”。广西有一个地方，公社书记看到社员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增加，就惶惶不可终日，

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到来。愈到下面，这种情况愈严重。

三、在计划平衡上，长期受到不平衡绝对性的极左思潮的支配。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平衡——平衡的打破——新平衡的建立”的过程中行进的。毛主席指出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并且指出平衡的打破，必须继之以新平衡的建立。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就是计划性”。而多少年来，我们却把不平衡的绝对性加以绝对化，事实上否定了相对的平衡，否定了新平衡的建立。把留有“缺口”称为“积极平衡”。这难道不是在欺骗自己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出现长期的比例失调呢？在军事上，我们懂得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唯独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被动当成主动，反而心安理得，自以为那是“积极平衡”！

四、在经济上，冒进的来源还有一个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因素在作怪。

(四)

提出几点建议：

一、要肯定我们的成绩，但也要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要认识多少年来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吃了“左倾”的亏，吃了冒进的亏，吃了盲目自大、盲目求快的亏。要客观地、冷静地总结多少年来我们在工业生产方面的经验。看来有必要来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启蒙教育。把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不仅存在于群众和基层干部中，而且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中层以至上层某些干部中。要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决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贫如洗的清教徒生活，并不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

二、每一个经济部门以至每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对于他们掌管的企业要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宁“左”勿右、欺世盗名的人，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继续破坏！

三、关于农业和工业的红旗，建议不要固定在某一企业。实践证明：把红旗固定在某一企业，就会滋长骄傲，固步自封；甚至得到特殊待遇，从红旗特权到红旗秘密，大家口里不说，心中有数。建议农业和工业的红旗采取流动方式。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我们应该提倡比、学、赶、帮、超。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一九七九年第二十六期

（选自《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95期）

当前应当研究的若干经济问题

孙 尚 清

第一个问题，农民生活怎样逐步改善，怎样加快发展农业经济。

陈云同志讲，我们要稳住农民这一头。这一点很重要，农民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要稳住这一头，就要逐步改善农民生活，就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当前，农业落后，工农比例失调，这是最大的比例失调。从1957到1977年，我们农业的劳动力由1亿9千万增加到现在的2亿9千2百万，增长了51%；而种植面积，却减少了5%，修工厂，铁路、公路用去了不少农田，同时也开垦了不少荒地。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的面积由1957年的8.7亩，降到现在的5.1。这个时期粮食的增产措施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还是有增产的。1957年到1977年，粮食产量增长了45%。可是，这个增长率却低于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很不理想。农业劳动力每人每年平均生产的产值，剔除物价因素，按不变价格计算，1957年是278元，到1977年却降为211元，减少了24%。据调查，四川省全省的农业固定资产（不包括土地和房屋）约50亿元，社员每人平均占有固定资产50元，说明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了，与我国工业比，也很不协调。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固定资产，约3千多亿元，工业人口（包括职工家属），每人平均占有固定资产约3千元，相当于农业的60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它反映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已经高于工业。美国农业的有机构成比工业高二、三倍，日本、西德等国家的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当然，我们的按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平均占有固定资本的算法，在口径上与有机构成不一致，农业的固定资产中，还未包括土地和房屋，但总可以反映出我们工农业的不协调情况。

为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中央已经强调要认真落实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各项方针政策；进口一些粮食，不多征购，让农民吃得饱一些，使农业生产有一个好的条件。还决定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这样，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可从中得到10元的收益，当然，产粮区、卖粮食多的社、队收益更多，而粮食刚够吃的地方，此项收益就少了。

究竟应当怎样有效地把农业这个短线拉长，怎样使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比例协调起来，把农业内部的比例搞好，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农民的吃、穿、用不断有所改善。搞现代化建设，不能老让农民“紧吃”、“紧用”，总要不断改善，才有积极性。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我们经济学应当究研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城市居民生活怎样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这个问题也包括怎样安排城市待业人员就业，怎样把职工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

来，联系起来，使我们每一职工不但能从主人翁的政治立场关心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而且能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这是一个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题。

我们过去在理论上往往强调，社会主义没有失业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不会有失业问题。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有各种各样具体的情况。在我们的具体条件下，一个家庭就业人员增加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的途经是多方面的，既有提高工资，也有提高集体福利，改善商业、服务网点设施等等。怎样正确说明改善生活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什么样的消费水平是适当的，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怎样正确发挥等等，这些也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或者说怎样走合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反映中国的基本特点。小平同志讲到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最基本的。此外，我们在究研这个问题时，还可以考虑一些其它的特点，比如，我们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等特点。我们搞现代化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外国搞现代化不能完全一样，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千差万别的。日本的国土37万多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发展工业的资源几乎什么都没有，煤炭有一些，年产量也只有2千多万吨。而我国的国土相当于日本26倍，发展工业的资源几乎样样都有，并且蕴藏量很丰富。仅就这一点说，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与日本就应有很大的不同，更不要说人口多、底子薄的特点了。当然，现代化这个概念毕竟是指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具体途经有许多是一致的。

我们人口多，怎么克服人口多带来的困难，发挥人口多的长处，大有文章可做。中国人总得在中国生活劳动，有人建议到外国去包工，即使同意这么搞，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去国外承包工程上去，还得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的人，尽量使之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努力劳动，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怎样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实现这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复杂、很重要的课题。

另外，怎样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这个问题有禁区，所以我们经济学界长时期对人口问题研究得非常薄弱。

第四个问题，怎样改进我国的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这个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使用时，是指生产关系。有时，马克思又用这个术语去表达生产方式的概念，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这里说的经济结构更偏重具体性，主要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但不是单纯从数量关系的角度提的，而是指各经济领域、各部门、各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系。经济结构合理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结构包括的内容很广，有农轻重的结构，有工业内部的结构，农业内部的结构，积累和消费的结构，还有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的结构，等等。此外，象大中小结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的结构，也应包括在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工农商服务等各部门中，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亦属之。

经济结构问题很复杂，例如怎样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安排社会经济技术结构和劳动就业结构，就是极为复杂的课题。按中国的情况，人口的40%多一点是劳动力，除了

老的少的念书的等等。1977年底，全国的劳动力是3亿8千6百万，其中农村3亿，城镇8千多万，城乡劳动力的比例大致是1:5。我们考虑经济结构时，不能不考虑劳动力每年增加多少，用什么样的经济技术结构把他们吸收进去，增加社会生产。同时，要使经济技术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城乡劳动力比例关系，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劳动力比例关系的变化。

看来，在一定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技术结构应呈金字塔形。大底盘是手工劳动，可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上面依次是半机械化、机械、半自动化、自动化。最省人的自动生产线是少数，但它代表了方向。

如果我们不考虑实际情况，过分强调省人的经济技术结构，就可能使生产领域里节省的劳动力同非生产领域里需要增加的劳动力不相适应，因为一个社会里非生产领域的人员有多少，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有减少的趋势，而非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力则增加，但必须把这两部分的增减关系衔接好，避免把生产领域应该吸收的人过早地抛出。非生产领域就业人员大规模的扩大，也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我们究研得不透，结构安排得不好，我们的经济就很难协调发展。有些先进的生产技术装备，也可以搭配一些半机械化的甚至手工劳动的辅助生产，这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是合理的。这也不一定降低经济效果，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事例，有时劳动生产率低了，却可以取得另外一种经济效果，即降低成本。

在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中，既要研究近期的最佳结构问题，又要研究怎样把近期结构和长远的战略性的结构合起来。

第五个问题，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和当前调整同改革的关系问题。

这既有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又有改革的起步点等具体步骤和方法问题。目前怎样使调整和改革互相促进。调整和改革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有些改革措施有利于调整，同时，不调整也不可能进行重大的改革。

还有扩大企业权限问题，扩大企业权限的条件、限度和理想目标，要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很好总结试点经验。

第六个问题，怎样把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同我国现有企业的现代化相结合，同我们原有工业基础的现代化相结合。

引进的东西同自己的特点相结合，就不能真正做到为我所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引进别国的先进技术，资本家在引进时都很注意同自己的特点相结合，通过引进使原有企业现代化。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和自己的工业基础结合。我们近三十年建设起来的工业基础不能小看，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总的看还是落后的。应当通过引进把我们的工业基础的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出来，把原有企业的现代化带动起来，而不能弄成越引进我们的工业基础越没事干，不能让我们原有的机器制造业变成外国设备的修理行业。适应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变化，怎样安排引进技术专利、图纸与引进成套设备的比例，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之一。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有许多经验，中国这几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需要在理论上很好地研究和概括一下。另外，引进后还要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改进、提高、创新。我们的技术水平整个来说是落后了一大截，但也有某些领域是较先进的，有些科技人员是有真材实学的。我们中国

人民应当对世界有所贡献，不能总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随着我国工业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引进中设备的比重要降低，大量的应该是图纸和专利，我们也可逐步出卖自己的专利。资本主义国家出卖的专利，通常也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搞出来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把引进项目的规模和速度安排得与我国一定时期的具体经济情况相适应。否则，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是先进技术装备，产品也是需要的，但由于规模过大，占用资金过多，反而对当前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利。在经济上常常是，若干年后要作的事，今天必须想到它们，准备到时去作，但如果立即动手作，却是不经济的，因为它同今天的具体经济条件不相适应。

第七个问题，增加外汇收入的问题。

要研究怎样从经济上发展旅游，发展手工业品，发展工艺美术品，选择并发展我们自己的战略性出口商品，这种战略性出口产品，要有国际竞争能力，换汇率要高。国际上也有互通有无的问题，每个国家也都各有所长。国际贸易要发展。增加外汇收入，这是国家经济上很迫切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由上海到南京，看到在火车上挤了很多外国人，据了解，由于外国人买飞机票要贵两倍，而火车票不涨价。我很奇怪，为什么飞机票对外宾、华侨涨了价，而火车票却不涨价呢？这也少得了外汇收入嘛！

最后一个问题，进行三十年经济理论的总结性研究，从中吸取必要要的经验和教训。

近三十年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有很多是我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某些片面性理论的恶性发展。那些极端片面的理论和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之间很难看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是就理论形态说的，政治本质当然不同了，他们是一伙反革命，政治上不能相提并论。比如我们六十年代讲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强调到那个程度，几乎不要社会主义阶段了，那末，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准备的物质基础怎样去搞呢？不去认真搞物质基础，片面强调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革命，结果证明这种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搞革命，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要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观点，都可以直接得出它要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结论。这些观点，“四人帮”当然可以一下子就接过去，用以达到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经济理论的片面性和极端化是害死人的。

对三十年经济理论进行总结性研究，对于我们今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提出以上几个问题，很不全面，很不周到，想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文选自“经济学动态”79年第8期）

实现四化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革

马 洪

邓小平同志在今年三月三十一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个思想，非常重要。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要降低现代化的标准，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搞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就先要看看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解放前，我们国家的工业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农业占90%。现在，我们工农业总产值里，工业占75%，农业占25%。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状况和过去有很大不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解放以前，我国的产业职工只有三百万人左右，现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产业职工约有五千万人。解放前，全国的大小工厂也不过十多个，而现在我们有三十五万个企业，加上交通企业有三十八万个。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现代化的工业，是七十年代中期甚至后期的水平，但是，目前还为数不多；多数的企业则是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水平。此外还有大量比较小的，比较土的企业。虽然如此，但应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基础了，这个基础不仅解放以前没有，就是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基础是来之不易的，是一个好的基础。这是我们前进的出发点，前进的基地。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来考虑我们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按人口平均我们的国民收入在世界上还是一个贫穷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就要考虑怎样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的条件，就是说要趋利避害。

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又有这么多人，人民又勤劳勇敢，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国外的经验，等等。我们的不利条件，也是人口比较多，因为人口多，就业和改善生活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底子也很薄。毛主席讲的“一穷二白”的状况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搞现代化，还有各种阻力，一个知识不足，一个是没有搞现代化的经验，一个是习惯势力，一个是思想僵化、半僵化，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破坏，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于这些绝不能低估。但是，我们也绝不要悲观。我去年到国外去看了一下，最近又研究了邻近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对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信心更足了。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来，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

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调整我们多年形成的不合